

知宋,而后知宋代之文学

王兆鹏与宋学达先生共同主编的《知宋·宋代之文学》,作为“知宋”丛书系列的一种,令人耳目一新。该丛书旨在为有一定文史基础并有兴趣进一步了解两宋历史的读者,提供方便学习的门径。其编纂理念是既注重学术性,又兼顾普及性,力求避免过于专业化导致受众局限,以及过于通俗化可能带来的内容浅显。在平衡这两者之间,把握恰当的分寸殊为不易。而该书的结构和选篇颇具匠心,全书由导论、23篇学术论文和后记组成,全面展示了宋代文学的丰富内涵。此书最显著的特征,是提供了理解和研究宋代文学的路径与方法,即“知宋,而后知宋代之文学”,反映出编者独到的学术眼光和见解。

知宋代文化而后知宋代文学

众所周知,宋代文化在我国历史文化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。陈寅恪先生认为“华夏民族之文化,历数千载之演进,造极于赵宋之世”。因此,不了解宋代文化,则难以贴近把握宋代文学的面貌、特征、地位及影响。故此《导言》首先谈“唐宋变革论”,了解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唐宋变革,诸多现象就可迎刃而解。本书以此发端,引导读者步入“唐型”与“宋型”文化背景下的唐宋文学。两种文化范式下的唐宋文学,区别有三:创作思维上,表现为“情感导向”与“思维导向”的区别;书写表达上,表现为“崇高理想”与“回归生活”的对立;文化消费领域上,表现为“文人审美独占”与“大众文艺兴起”的分别。弄清宋调的特色后,编者进而阐述

了宋调形成的历史原因,一是以文立国,科举变革;二是文教大兴,印刷普及;三是文人参政,关注现实。编者还注意到,宋调的形成,民间文化消费的崛起,深层里与宋代特殊的经济结构相关,特别是宋代土地兼并、农民起义等促使“农民”向“市民”身份的转变,造成“民间文化”与“文人文化”的双向发展,二者相辅相成,凝定成“宋调”雅俗共赏的审美趋向。可以说,《导言》确立宗旨、概括要领,实现了对宋代文学的宏观驾驭。

知宋代文体而后知宋代文学

“知宋”系列丛书,旨在精选专业学者的研究成果,向广大读者系统介绍宋代各领域的历史文化。然如何编排,形成一有机整体,让读者对宋代文学有立体而完整的认识,颇费苦心。常规的做法是以作家为中心,依作家时代先后排列,纵向展示宋代文学的发展历程。然编者以文体编排,就传达出另一核心理念:知宋代文体而后知宋代文学。编者意在突破“唐之诗、宋之词、元之曲”这一“文学代胜观”,而全面展示宋代文学各体皆盛的风貌,故全书分为三大板块:“宋诗”“宋词”和“宋文与话本小说”。各板块之下,采取先总后分模式,编排各类文章。首篇为综论,探讨某一文体在宋代的发展史及其特征,继而是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或专题研究,以时间先后编次,以收“点面结合”之效。这样,文体为第一层级、时间为第二层级、作家作品为第三层级,实现了对宋代文学三位一体的呈现,颇具匠心。必须指出,囿于所选

文章仅有23篇,其中宋诗9篇,宋词9篇,宋文4篇,而宋话本小说仅有1篇,导致篇幅分布不均。若将话本小说另置一节,难免孤立,因此编者将其与宋文整合。

观察篇目的数量分布,读者或许会形成这样的印象:宋代文学中,宋诗与宋词占据核心地位,且平分秋色,其次为宋文,再次为话本小说。然而,编者真正想传递的观念是:文学成就虽有高低之别,但文体本身并无高下之别。以宋诗为例,明人李梦阳、陈子龙认为其成就远逊唐诗,而编者认为宋诗足以与唐诗比肩,形成“双峰并峙”之势。同样,在宋代被视为“小道末技”的宋词,在编者眼中却是极具“灵性”的文学形式,能够充分展现作家性情,与“宋诗”分庭抗礼。关于宋文,编者重视“美文”之外的应用文,因中国古代的文学观是“杂文学观”,这与西方的文学观截然不同,故科场论文亦有所选。至于宋话本小说,编者认为是宋代文学中不可或缺的“民间文艺”,为宋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古典文学注入了新的生命力。以文体引领读者走进宋代文学的园圃,展示了编者深邃的学术眼光,亦与近些年来文体学研究的方兴未艾,以及学者们不断倡导回归文学本位的研究理念相契合。

知宋代文论而后知宋代文学

在所选23篇文章中,有4篇专论文学理论,分别是党圣元《苏轼诗学批评之义理及其特点》、莫砺锋《黄庭坚“夺胎换骨”辨》、吕肖奂《“法度”到“活法”:江西诗派内部机制的自我调节》、宋学达《再论苏轼词的词史定位——兼及如何打破“婉约”“豪放”二分法》。此外,尚有若干篇章在不同程度上涉及文论,如马骥葵《时带唐风情韵,然已入宋调:谈欧阳修诗歌的诗史意义》,对欧阳修“诗穷而后工”“平淡”“以气格为诗”等诗学观念有所勘察。将这些文章合并考虑,可见文论方面的篇目占比不小。显然,编者有意引导读者了解宋代文学的理论批评,编者意在表明知宋代文论而后知宋代文学的理念。

之所以如此,实因宋代诸多文

学现象与文论紧密相连,不少作家的文论不仅指导当时创作,亦影响后世文坛。例如,黄庭坚的诗歌书写主要源自其“夺胎换骨”“点铁成金”理论,其追随者亦受此理论沾溉,而黄庭坚却遭“剽窃”之讥,莫砺锋先生从多角度为其正名,可谓截断众流。再如,从黄庭坚的“法度”到吕本中的“活法”,江西诗派内部一直进行理论更新,吕肖奂先生于此有精辟论断。同样,“婉约”“豪放”二分法自明人张綖提出后,成为一种强势理论主导着词学研究,宋学达先生以苏轼为切入点,认为“东坡范式”最能体现词学研究的时代前沿性,并建议以“新二分法”取代“旧二分法”,展现了当代学者理论创新的勇气。

苏轼的诗、词、文、理论批评均造诣深厚。在宋诗部分,编者未选苏轼诗歌的研究文章,而以理论研究代替,一方面因党圣元先生的文章对苏轼诗歌理论进行了全面分析,另一方面体现了编者对苏轼诗歌理论的格外重视,这也印证了知宋代文论而后知宋代文学的理念。

文论研究可协同省察“宋调”之生成,其功能在于策应文学研究,而非代替文学研究。故总体布局上,文学艺术的研究占比更大。“宋诗”部分,有赵晓兰《宋诗一代面目的成就者——王安石》、张剑《陆游的醉态、醉思与饮酒诗》、张宏生《十三世纪的诗坛劲军:谈南宋江湖诗派》;“宋词”部分,有刘扬忠、陶然、李康、李庚、程章灿、陶文鹏、陶尔夫、姚大勇等学者对柳永、周邦彦、叶梦得、李清照、辛弃疾、吴文英、张炎等作家作品的阐释;“宋文”部分,有张海沙先生对苏轼《记承天寺夜游》的赏析。总之,只有把文论与文学参合并观,方能叩开宋代文学的大门。

“知宋”丛书的初衷是以宋代的政治制度、君臣、法律、科举、军事、城市与乡村、货币、交通、科技、儒学、文学、书画艺术、建筑等专题展现两宋时期的历史面貌。按照原旨,《知宋·宋代之文学》当是知宋代之文学,而后知宋。编者却反其道行之:知宋,而后知宋代之文学。二者实为相生相济之关系。就“知宋”而言,该书已完成了任务,而其提供的方法论或许更具价值!

(据《中华读书报》王天觉/文)

钱穆上课

著名史学家钱穆给小学生、中学生和大学生都讲过课。他的课堂精彩百出,时有妙语,常常逗得学生笑声不断。

有一次,他给小学生上作文课,强调“作文就是说话,口中怎么说,笔下就怎么写”,并出了作文题目《今天的午饭》。作文交上来之后,钱穆认为有一篇写得比较好:“今天的午饭,吃红烧肉。味道很好,可惜咸了些。”他以此为例,告诉学生作文要曲折、要有韵味。最后一句“可惜咸了些”就很有意思,有了它,作文则显得与众不同。

后来,钱穆到北京大学讲中国通史。讲课时,他穿一件发旧但干净的蓝色长袍,喜欢左手执书本,右手握粉笔,一边讲,一边从讲台的这端踱到那端,周而复始。钱穆善于言辞,长于演讲,讲到紧要处,像与人争论

一样,高举双臂,慷慨激昂;讲到高兴处,又巧妙譬喻,妙语连连。比如讲到中西文化的异同时,他将秦汉文化比喻成室内遍悬的万盏明灯,即便打碎一盏,其余犹亮;而将罗马文化比作一盏巨灯,熄灭了就一片黑暗。对于这样的比喻,学生听得进记得住。

由于听钱穆讲课的人太多,学校不得不将他的课堂设在北大梯形礼堂,面积是普通教室的3倍。每一堂课,听讲者将近300人,坐立皆满。更为夸张的是在西南联大时,钱穆上课的时候,教室过道都挤满了学生。钱穆“无路可走”,需要踩着学生的课桌才能走到讲台上。而在香港新亚学院时期,每当有钱穆的讲座,校内外赶来听课的学子人满为患,钱穆必须拨开人群,“开辟道路”,才能上台讲课。(据《人民政协报》王剑/文)